



1月25日,在美国旧金山,人们为亚历克斯·普雷蒂举行烛光悼念活动。 新华社发 朱子于 摄

从“古德之死”到“普雷蒂之死”,在相距不到两公里的地方,相隔17天,美国联邦执法部门接连夺去两条人命。

“古德之死”和近6年前的“弗洛伊德之死”,同样也发生在相距不到两公里的地方。执法暴力已令美国社会从“无法呼吸”走向“漫长窒息”。

美国暴力执法问题由来已久,在与种族歧视、贫富分化、枪支泛滥和制度性偏袒等社会积弊的相互交织下,沉痾难解;在共和、民主两党相互攻击、谋求政治利益的党争中,愈演愈烈。

从“古德之死”到“普雷蒂之死” 起底美国警察执法暴力

“街头屠杀” 一再发生的执法暴力悲剧

“他很温和,善良,特别有同情心”“他总是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”……

1月25日,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居民在寒风中悼念被枪杀的亚历克斯·普雷蒂时,这样评价这名重症监护室护士。前一天,37岁的普雷蒂被美国执法人员枪杀。

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称,普雷蒂当时携手枪靠近正在执勤的联邦执法人员,后者遭“暴力抵抗”后“防卫性开枪射击”。然而,目击者拍摄的视频很快拆穿谎言:普雷蒂手中拿着手机,没有画面显示他持有武器。

这已是明尼阿波利斯市本月第二起移民执法致死事件。7日,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(ICE)人员开枪打死美国公民蕾恩·妮科尔·古德。古德被射杀地点距离2020年5月黑人男子乔治·弗洛伊德遭“跪颈执法”而死的地方,仅有约1.6公里。

联邦执法人员的暴力执法点燃明尼阿波利斯市民众怒火。当地民众痛诉,“这是街头屠杀!”“冷血处决令人毛骨悚然……必须立即停止联邦暴力执法!”美国《纽约时报》专栏作家莉迪娅·波尔格林撰文:“在明尼阿波利斯,我看见一场内战。”

“对于我们居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市附近的居民,ICE暴力执法行动让我们恐惧和愤怒。”明尼阿波利斯市民亚当·明特说。

明特所说的ICE,在2003年由美国移民和归化局(INS)等机构整合而成,目前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最大的警察与海关机构。德国《每日镜报》网站报道,去年夏天以来,ICE执法人员在31起事件中使用枪支并造成11人伤亡,另有32人在羁押期间死亡,目前有约7万人被关押在ICE的拘留所。

ICE只是美国执法暴力的冰山一角。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研究显示,美国每年约有25万人在执法过程中因不当执法行为受伤,另有600余人死于执法人员之手。

“恶性循环” 执法暴力的历史与社会根源

美国执法暴力有深刻的历史根源,并与种族歧视、贫富差距、枪支泛滥等问题相互交织,形成“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”。

美国的执法和警察制度可以追溯到18世纪。当时,美国南方出现由白人组成的奴隶巡逻队,负责追捕从种植园逃跑的黑人奴隶。奴隶巡逻队在追捕过程中被允许使用鞭打等暴力手段。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网站刊文指出,美国现代法律体系深深根植于奴隶制。

这样的历史根源,让美国执法体系从诞生起便带有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。1838年,美国第一所警察局在波士顿成立,其目的是消除白人群体对治安问题的担忧。

执法体系中的种族主义让暴力执法长期存在并延续至今。“弗洛伊德之死”曾掀起美国数十年来最大规模抗议和骚乱,但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,5年多过去,近90%的受访者认为美国警察与黑人之间的关系并未改善甚至变得更糟。

贫富差距是透视美国执法暴力的另一视角。美国警务公平中心研究员贾斯廷·费尔德曼指出,美国贫穷白人也面临执法暴力威胁。社区人口贫困率与警察暴力致死率成正比关系,最贫困社区比最富裕社区的警察暴力致死率高出3倍多。

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刊文说,历史和现实表明,美国警察维护的是“白人至上主义、经济等级制度以及边境限制”。而“边境限制”正是“古德之死”的关键词。

此外,美国枪支泛滥与警察暴力执法之间也形成了一种“暴力循环”。多家机构估算,美国2024年民间拥有枪支数量约为4亿至5亿支,超过美国3.4亿多的人口总数。

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教授迈克尔·谢拉-阿雷瓦洛指出,在美国这样枪支数量远远超过人口数量的国家,警察等执法人员会假定任何一次执法行动都会遇到携带枪支的人,这影响着警察的日常训练、执法心态和武力使用规则。

“豁免护身符” 难上加难的暴力执法问责

近年来,美国社会对暴力执法的投诉屡见不鲜,但受惩罚的执法人员寥寥无几。普雷蒂遭射杀后,联邦政府第一反应即为执法人员辩解。美国犯罪学家塞缪尔·沃克直言,美国执法体系最大失败是无法对滥施暴力建立持久性问责机制。

美国学者认为,美国司法体系为执法人员打造了免责“护身符”。

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82年确立对公职人员的“有限豁免权”法律原则,规定警察等公职人员的伤害行为,只要不违反“一个理性人应该知晓的宪法和法规”,就可以免责。这一规定存在诸多模糊之处,使法官在具体案件判决时有较大解释空间,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要求必须有“情节完全一致的判例”,才能判定执法人员违法。因此,法官在审理这类案件中鲜少作出违法判决。

特朗普政府近日还声称,射杀古德的ICE执法人员应“享有绝对豁免权”。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刊文指出,所谓“绝对豁免权”意味着,所有与ICE执法行为相关的指控在进入调查取证阶段前便会被直接驳回,将从根本上改变执法行为既有规范,进而对美国执法体系产生更为深远的负面影响。

除司法“护身符”外,美国的执法机构体系也弱化了问责机制。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报告显示,美国警察机构分联邦、州、县、地方四级,各级机构相互独立、自主权极大,这也导致联邦层面的问责体系形同虚设,连不当执法的信息都难以掌握。

“仇恨撕裂” 党争极化下的执法暴力

暴力执法问题始终未能解决,背后是一个深陷党争漩涡的美国。

两起射杀事件后,两党在事件定性、调查权限上各执一词:特朗普政府及共和党阵营将普雷蒂和古德定性为“本土恐怖分子”“职业煽动者”等,而民主党则谴责执法者滥用暴力,双方互指对方应承担全部责任。

有美媒评论,在移民问题高度政治化的当下,共和党需要为其“强硬执法”寻找辩护依据,民主党则把“暴力执法”塑造为攻击特朗普政府的靶子。随着中期选举临近,两党都急于证明自身立场的正当性,借此推进自身议程、拉拢摇摆选民,而公共安全再次沦为政治算计的牺牲品。

两党对立加剧社会戾气,也为暴力执法埋下祸根。正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:“普雷蒂之死”与其说是一起孤立事件,不如说是一系列矛盾问题累积的结果。”

当前,特朗普政府在推行强硬移民政策时,不断质疑少数族裔身份的合法性;而民主党人为争取少数族裔支持,将执法机构称为种族压迫的工具。这种“双向妖魔化”叙事激化了执法人员和民众间的矛盾。

愈演愈烈的党争还导致执法体系改革陷入停滞。弗洛伊德案后,民主党曾提出警察不当执法的问责法案,但两党为了政治利益在国会反复拉扯、相互掣肘,法案始终未能通过。执法系统改革被裹挟于党争中,暴力执法乱象难以根除,循环往复。

“美国已成为一个被党争仇恨撕裂的国家。”美国《时代》周刊写道。层出不穷的暴力执法、无休无止的两党争斗,是美国制度缺陷与治理失灵的又一例证,正加深美国民众对未来的迷茫与不安。新华社记者 阚静文 刘晨